

據馬班以高視許鄭： 王芑孫對乾嘉漢學的批評及其意義

蔡長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王惕甫芑孫，短小精悍，善詩古文。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屢試未售，終於江陰教諭。曾館睿恭王邸，王甚重其人。嘗隨王之灤陽、木蘭等處，詩愈遒勁。王稍有過，惕甫務厲色呵之，使冠帶謝過乃已。

愛新覺羅·昭榘：《嘯亭雜錄》卷四

前言

王芑孫(1755–1818)，字念豐，號鐵夫，更號惕甫，又號楞伽山人，晚號樗隱老人、老鐵等，清江蘇省蘇州府長洲縣(今蘇州地區)人。王氏為明弘治、正德間名臣大學士王鏊十世孫，生長於經濟富庶、文化繁榮之吳中地區。幼穎異。既冠，補諸生，為學使嘉善謝墉所推重。繼而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深為院長長洲彭啟豐所激賞。其後諸城劉墉、南昌彭元瑞先後督學江蘇，亦皆蒙識拔，聲名藉藉諸生間。壯歲入京，先後館於富陽董誥、諸城劉墉、睿親王淳穎等公卿顯宦之府，頗受倚重；又與在京名流如法式善、洪亮吉、何道生、吳錫麒等詩酒唱和，聲氣極盛。中年南歸，曾任華亭縣教諭、候補國子監典簿；後應兩淮鹽運使曾燠所邀，主講真州樂儀書院凡七年。晚年歸里，杜門著述而終。芑孫生性簡傲，少可多否，與公卿若平交，故人以為狂。早懷經世之志，而豐才奮遇，潦倒場屋。乃肆力於詩古文詞，以辭章之學享譽海內。當時已與洪亮吉、孫星衍等大家齊名。其友無錫秦瀛曾曰：「近數十年來，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拔起東南。雖終其身祇一為校官，晚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鶩一世，光氣照耀，不可掩抑，世之人稱之無異辭。」¹庶幾可作其一生之定評。²

¹ 秦瀛：《小峴山人續文集補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道光間補刻本，〈王惕甫墓誌銘〉，頁三三上。

² 以上王氏生平述略，引自睦駿所撰王氏《年譜》。據睦駿考證，王芑孫卒於清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以公曆推之，時當公元1818年1月7日。一些人物傳記索引作1817年，蓋未注意農曆與公曆之別。見睦駿：《王芑孫年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前言〉，頁1。

王芑孫之生平交遊以及在文學與書法上的成就，乃至對當時學風的批判，眭駿《王芑孫年譜》已經做了精要的概括。另外，在《王芑孫研究》一書裏，眭駿又對楊甫之制行、著作與文學成就，做了更進一步的整理與介紹。³所以，以一個文人身分顯揚聲名於當世的楊甫先生，這兩部分量十足的研究成果，似乎已足夠讓後人了解其人其學了。但個人以為，除了芑孫的詩歌辭賦乃至古文之成就需加關注，他在詩歌文章的議論裏所透顯出來對當時學術現象的批判，和這些批判背後所顯示出其個人對學問之道的見解，以及文人在堅持所學的同時，所顯現出的對人生道路的抉擇，都是清代中葉學壇的一篇大文章，不但顯示出楊甫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也反映了清代中葉學壇的複雜現象，卻是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與重視。所以，本文撰作的目的，不在於強調作為一個堅持文士傳統與理念的楊甫先生，他的文學成就如何值得關注，其詩文風格有哪些特徵，在清代文學史上居於何等位置，而是想從楊甫詩文中大量的學術評論裏，鉤稽其探討學術優劣與人生蘄向的相關言論，然後置之於清代中葉以降學術流變的視野，用以剖析這些議論對楊甫個人以及對清代中葉以降學壇而言，有何意義存焉。

對乾嘉漢學之批評

仔細分疏的話，清代中葉學壇上的漢宋之爭，表面上是經學與理學之爭；從學壇話語權爭奪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視為文士與經生之爭。原因不難推之，那些宋學護法，諸如桐城一系的方苞、姚鼐、陳用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等人，從立身處世至學術優劣的價值觀上，都是立足於宋學的，但他們對宋學的理解或研究，既難以企及清初的理學名臣，更遑論能比肩於朱子後學。不過就是自少浸淫時文，致力於文章之道，期能以文章名世；而又朱注爛熟於胸，在科舉角鬥場不斷的磨礪之下，宋學義理已內化到文章血脈之中，難以自拔。⁴與那些立志於重振漢學門庭，對

³ 眭駿：《王芑孫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此書與《王芑孫年譜》實為眭駿博士論文之上下編，因篇幅過大，難以整為一編，故出版時一分為二。

⁴ 嚴格來講，乾嘉時期已罕見有從哲學體系上用心勤力、有所發明的理學家，即使如清初的理學名臣，亦不多見。宋學的支持者，最顯著的是桐城派及以文章名世的諸多文人。如王家儉即言：「將近一個世紀以內，漢學家雖然對宋學展開全面的攻擊，可是除了桐城派的古文家，如姚鼐、方東樹等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外。在當時的理學家當中，卻很少有人提出系統而有力的答辯。」暴鴻昌亦言：「乾嘉時代漢學家卻屢遭同代學者之攻難，被斥以門戶之偏。細檢各家所論，令人驚奇發現，這些責難文字竟不是來自宋學家，而是來自文士。……如果把乾嘉時期攻擊漢學最厲者列舉出來，那麼應是袁枚、蔣士銓、錢載、姚鼐、王芑孫等人。但以上諸人無一為理學家，而為文士，即詩文家。」龔鵬程則言：「在樸學興起後，仍能揚宋學之纛、講程朱之學者，反而是桐城派。自方東樹撰《漢學商兌》，以迄桐城派流行而出的曾國藩湘鄉派，都講義理、倡宋學，不僅以文藝為主

〔下轉頁173〕

科舉之學能自覺疏離的考據家相比，可謂在覺醒之路上，被漢學家視為守舊或是不學的代表。⁵

王芑孫基本上也是以宋學為價值觀，以文章表現其學識見地的傳統文士。所以他對新興的漢學考證風潮，有一種鮮明的敵意。在乾嘉之際，有這種敵意者並不乏其人，但有別於太平天國亂後的咸同之際，理學的支持者乘再起之勢，能對乾嘉漢學作清算式的批判。⁶在漢學光芒籠罩的乾嘉之際，即使堅持宋儒義理如桐城領袖姚

〔上接頁172〕

旨。但世人所看重的，或所認識的桐城派，其實仍只是個文派。」詳細討論，請參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年），第三章〈康熙時代之朱學〉，頁119-62；第四章〈論清代經學——以考據治經之起源及其成就之限度〉，頁163-96；王家儉：〈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載王家儉：《清史研究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78；暴鴻昌：〈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辨析〉，《史學集刊》1997年第2期，頁67；龔鵬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載《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2000年10月），頁291-92。

⁵ 例如楊向奎就說：「望溪文人，涉獵者廣，堪稱博學，但非經師，亦非理學家。不能以經學和理學成就評價他。」反映的就是清代漢學家對以科試為治學目的之文人的普遍看法。南宋以來，往往以文學作品看待四部典籍，方苞之治經亦受此風氣影響，而且著重以文章闡釋經義。而且從〈周官析疑序〉、〈周官集注序〉兩段文字所陳述的治學態度背後，我們可以看出方苞深受時文評點的影響。為此，方苞所揭古文義法與時文之關係，常為當時學者詬病。換言之，方苞以文章闡述經義，並無法迴避一個問題：亦即在方苞而言，古文與時文究是一而二抑或二而一？他自己也難以解釋清楚，亦難怪招致錢大昕之譏。錢大昕甚惡方苞，嘗徵引金壇王澐批評桐城之言曰：「靈皋以古文為時文，以時文為古文。」又在〈與友人書〉中痛詆方苞，謂其未喻乎古文義法：「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說方氏所得是古文之糟粕，而非古文之神理。錢氏直接的將桐城派之源與八股時文畫上等號，並譏方苞為不讀書之甚者，可謂謔而又虐。就好像翁方綱批評魯絜非之治《易》，「猶是時文家言耳」，同樣反映出了治考據之學者對科舉之儒以文章表現經義的偏見與鄙視。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第3卷，頁39；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三一〈跋方望溪文〉，頁565；卷三三〈與友人書〉，頁607-8；翁方綱：《復初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清李彥章校刻本，卷十〈易漢學宋學說答陳碩士〉，頁二上至三下。

⁶ 咸同之際文人，頗有歸咎太平天國之亂於漢學者。如孫鼎臣、魯一同即痛斥世運之厄、人心風俗之流失陷溺，皆肇因於漢學之盛。當其時，如顧沅、潘錫恩等皆以正氣為名，刊行《乾坤正氣集》，其編纂之動機，頗有以漢學風潮為邪惡之他者，污染學術人心，使士節不振，致國家遭此之劫難，故必欲去之而後快。見孫鼎臣：《孫芝房侍講芻論》，清咸豐十年（1860）刻本，卷一〈論治一〉，頁一上至五上；魯一同：〈覆潘四農丈書〉，載郝潤華（輯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頁363-65；王鏊：〈序〉，載潘錫恩、姚瑩、顧沅（輯）：《乾坤正氣集》，清同治五年（1866）新建吳坤修皖城刊本，頁一上至二上；顧沅：〈序〉，載潘錫恩、姚瑩、顧沅（輯）：《乾坤正氣集》（臺北：環球書局影印清道光戊申年〔1848〕涇縣潘氏袁江節署刊本，1966年），頁1-2。